

胡适

谈国学

谈哲学

谈人生

胡适◎著

70载读书、做人的思想精华

胡适，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纵横学界、政界、文化界的偶像和伟人。

本书不仅表现了这位国学大师的精辟观点，更意在对大众普及胡适先生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最大限度地还原胡适先生的思想精华。

中国华侨出版社

胡适

谈国学谈哲学谈人生

胡适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谈国学谈哲学谈人生/胡适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13-4679-7

I.①胡… II.①胡… III.①胡适(1891~1962)—国学—研究②胡适(1891~1962)—人生哲学—研究 IV.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635 号

胡适谈国学谈哲学谈人生

著 者: 胡 适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木 笔
版式设计: 王明贵
文字编辑: 胡宝林
图文制作: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 × 1200mm 1/10 印张: 46 字数: 780 千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679-7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010)58815874 传真:(010)58815857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胡适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对国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次对旧有标准的反叛和革命。1919年12月，胡适在文学革命的领军刊物《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正式呼吁从理性出发，对当时的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及信仰这三方面进行重新评估。胡适将自己怀疑的精神和吸收的外国新思想融入其深厚的国学基础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旧瓶装新酒”一般给予国学新的生命和活力。今天的人们或许对这些佶屈聱牙的考据感到厌烦，也对许多国学经典知之甚少，但是在这些看似干枯的文章里流淌着实证主义的思想、“格物”的精神等历久弥新的血液，我们要学习的，或许并非只是比别人多懂一点儿的国学“死”的知识，而是怎样看待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书“胡适谈国学”部分辑录了胡适大量“整理国故”的研究文章，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了解胡适“整理国故”的成果，在增加对国学的学习兴味和研究热情的同时，也培养独立的判断和敏锐思考的能力。所选文章，有些结论虽然仍然有待商榷，但是在当时各种思想禁锢尚未完全破除的时代，能够有此种大胆对传统进行反叛的“于不疑处存疑的实证精神”，仍然是可敬的。

胡适的哲学理论作为新旧文化碰撞交替的时代下的产物，便同样具有了“中西合璧”的开放视角和思想维度。胡适晚年自述道：“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这一点可以在《四十自述》中所述的九年家乡教育中得到印证。可见，胡适对于哲学的了解与研究，始于幼年所读的“文史不分”的典籍之中。而当他作为庚子赔款背景下留美的学生，在1910年入学康奈尔大学时，曾由农学转入文理学院，主修哲学，吸收了许多外国哲学新思潮和方法论的新鲜养料，并由此反观中国古代的哲学问题，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一些不俗的作品。胡适对于哲学的研究并未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可以自圆其说的独立系统，这也使得他的哲学研究始终保留着西方哲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规范，由此生发出的哲学观点便以不同的背景和证据呈现出某种游移的倾向，但也因为这种“游移”，没有牢不可破的固定观点，使得他的哲学研究如“源头活水”而呈现出开放的观点和怀疑的精神，这种为学的思维方式和包容的胸怀是我们需要借鉴的。本书“胡适谈哲学”部分辑录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有关哲学论述的文章中较有代表性的篇目，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胡适哲学研究的兴趣，进而对自己的思维方法有所反思和提升。这些文章既可以当做哲学入门的阅读材料，也可以作为了解胡适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如何接受外国哲学思想影响的资料。

胡适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正是“一个像样子的梦”。他的一生受他的母亲影响

最大，母亲用她包容的爱和做人的刚气给他的个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家学和旧私塾的扎实功底，新学堂和留学生活的新鲜空气都让胡适对事物多了一丝怀疑和考察证实的“考据”精神，多了一丝包容而不至偏激。如果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胡适显然是个例外。他写自己人生经历的文字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或许带了一丝笨拙，却朴实真挚。他讲述自己家的往事，爱憎分明，不加雕琢，全然没有护短之嫌和粉饰之意。他讲述人生的选择和感悟，经常是讲给学生或是青年人，没有说教的刻板和做作，那一番热情的话语让人鼓起奋斗的勇气又不失深度的思考。他的人生观可以说是较为纯粹的“个人主义”，这几乎是统领他大多数有关人生文章的中心。他注重自身的价值和自我实现，但并非偏狭的自私，而是相信只有将自己铸造成器，维护好自己的尊严和权益，才能更好地给社会以推动力。胡适的一生正如梦一般的跌宕起伏，颇富有戏剧性和争议性，他自己也在努力做出一个像样子的梦，他做到了。本书“胡适谈人生”部分辑录了胡适带有自传性质的《四十自述》和一些其他有关人生的感悟和选择方面的文章，希望尽可能多地展现胡适的人生和胡适眼中的人生。一些对胡适知之甚少的人会因他身上所着的政治色彩对之大加贬斥。然而，当你耐心品味他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实感时，你就会发现和你印象中不太一样的胡适，由此，你或许对人生多了一丝感悟，或许在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中印证和反省自身的存在，或许引发了内心的火焰而成就一番事业。

目录



胡适谈国学

浅谈诸子百家	3
说儒	3
关于孔子	14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17
关于荀子	19
天与性	21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25
道家	33
道家的来源与宗旨	35
关于老子	39
中国文化与思想论	46
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	46
谈谈中国思想史	47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	49
推论与思想	55
书院制史略	57
名教	59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63
新思潮与国故研究	65
新思潮的意义	65
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68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69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的信	75
研究国故的方法	77
再谈谈“整理国故”	78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80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86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91
打破浪漫病	94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96
对传统典籍的考据	102
谈谈《诗经》	102

读《楚辞》	106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108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124
对中国历史的看法	135
说史	135
史学与证据	137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139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142
论《春秋》答钱玄同	146
读《吕氏春秋》	147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150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152
井田辨	155
淮南王和他的著书	161
读《北史》杂记	163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166

胡适谈哲学

我的哲学观	173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173
哲学与人生	182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84
杜威先生与中国	190
不朽——我的宗教	191
哲学研究与方法论	195
逻辑与哲学	195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197
哲学的将来（提要）	199
东西文化之比较	200
墨子的哲学方法	205
中国哲学小论	208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08
易	210
正名主义	213
一以贯之	217
墨子的宗教	223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225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229
所谓法家	234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241
古代哲学之中绝	243
中国哲学的精神	248
中国哲学的线索	248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50
那时代的思潮	260
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61
域外哲学研究思潮	268
杜威哲学	268
实验主义	278
自由主义	296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298

胡适谈人生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321
人生有何意义	321
新生活	321
人生问题	322
少年中国之精神	323
学生与社会	325
略谈人生观	327
科学的人生观	328
《科学与人生观》序	330
工程师的人生观	337
我的歧路	339
差不多先生传	341
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	342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342
大宇宙中谈博爱	346
易卜生主义	347
青年人的苦闷	354
有所反省的人生必得容忍	357
容忍与自由	357
信心与反省	359
再论信心与反省	362
三论信心与反省	364
你是自己的材料，只有一生用来铸造	368
谈谈大学	368
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369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371
智识的准备	374
敬告中国的女子	378
给北大哲学系 1931 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381
赠予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381
做人与读书——致胡祖望	383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384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384

归国杂感	386
慈幼的问题	389
没有理想，我们的心将安放何处	391
梦想与理想	391
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	392
为什么读书	392
喝酒不过是为了忘记喝酒的耻辱	395
每一次尝试都是挣脱枷锁的开始	398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398
白话诗的初体验	403
肩上扛起生活，双脚丈量人生	410
让我读书是父亲的心愿	410
那些年比别人多念了一点儿书	411
小说的迷恋	413
母亲的和气是我一生百慕不厌的图画	415
从拜神到无神	416
我的专属孔庙	417
形神一体的观念由此开始	418
巧扮鬼神附体逃责难	419
读禁书痛骂上海道	420
澄衷学堂初露锋芒	422
初入公学的白话训练	425
被“蛊惑”的律诗狂热	429
游走于老师和学生的双重身份之间	431
改名闭关幸得留美	434
我的儿子	434
我的车和我的车夫	436
朋友是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438
孙行者与张君勱	438
宣统与胡适	439
“老章又反叛了！”	440
追忆曾孟朴先生	442
追想胡明复	442
追悼志摩	445



胡适谈国学

浅谈诸子百家

说儒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有《原儒》一篇，说“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墨子·经上篇》说名有三种：达，类，私。如“物”是达名，“马”是类名，“舜”是私名。）……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汉书·司马相如传》语。《史记》儒作传，误）。……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早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鹩（《说文》），舞早暎者以为衣冠。鹩冠者，亦曰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圜字作鹩。《续汉书·舆服志》云：“戴冠前圜。”）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咳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

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

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论语》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不能推想这句话的含义。若依章太炎的说法，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这句话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类名”的儒（其实那术士通称的“儒”才是类名）。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另立一类“六艺之人”的儒。此说的根据只有《周礼》的两条郑玄注。无论《周礼》是否可信，《周礼》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联师儒”，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郑玄注里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何况《周礼》本身就很可疑呢？

太炎先生说“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此说目无可疑。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只是因为“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而孔子也只好“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这种说法，很难使我们满意。如果《周礼》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

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说，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那么，“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更够不上“达名”了。若说这里的“儒”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那么，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道”和那最广义的“儒”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太炎先生说，“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原道上》，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

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原道上》）

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我们也还要问：那位征藏史（老聃）同那广义的“儒”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

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

二

“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孔子说的：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我在上文已说过，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已很杂了。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儒”字的古义。《说文》：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术士是有方术的人；但为什么“儒”字有“柔”的意义呢？“需”字古与“奘”相通；《广雅·释诂》：“奘，弱也。”奘即是今“软”字，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考工记》：“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则需。”郑注云：“故书，需作割。郑司农云，割读为柔需之需，谓厚脂之韦革柔需。”《考工记》又云：“厚其帛则木坚，薄其帛则需。”此两处，“需”皆与“坚”对举，需即是柔奘之奘。柔软之需，引

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儒”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墨子·公孟篇》说：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于墨子。

又说：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带（《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是俗儒者也。

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说详下），而其形式——逢衣，博带，高冠，搢笏——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

所以“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士冠礼记》云：

章甫，殷道也。

《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

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

……

所以在周初几百年之间，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傅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引见下文）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股商文化。

……

但统治者终是统治者，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屑模仿那被征服的民族的文化。况且新兴的民族看见那老民族的灭亡往往由于文化上有某种不适于生存的坏习惯，所以他们往往看不起征服民族的风俗。

……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学那亡国民族的坏榜样！但是可注意的是《酒诰》的末段对于周的官吏，有犯酒禁的，须用严刑……在这处罚的歧异里，我们可以窥见那统治民族一面轻视又一面放任那被征服民族的心理。

但殷民族在东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人数是很多的；虽没有政治势力，他们的文化的潜势力是不可侮视的。孔子说过：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几百年后一个有历史眼光的人的估计，可见周朝的统治者虽有“所损益”，大体上还是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物。这就是说，“殪戎殷”之后，几百年之中，殷商民族文化终久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

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一切民族都难逃免，我们不用说他。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很有重大的关系。

在那个天翻地覆的亡国大变之后，昔日的统治阶级沦落做了俘虏，做了奴隶，做了受治的平民。

……

但我们知道，希腊的知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倒了罗马帝国之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士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殷商的知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俘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于征服了战胜者的武器——殷人的宗教。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如果《鸿范》是一部可信的书，那么，占卜之法到了殷商的末期已起了大改变，用龟卜和用兽骨卜之法之外，还有用蓍草的筮法，与卜并用。

这种宗教需用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俘虏，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他们在殷人社会里，仍旧受人民的崇敬；而统治的阶级，为了要安定民众，也许还为了他们自己也需要这种有知识技能的人，所以只须那些“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这一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就在那几百年之中，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是那新朝的“士”；“士”是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只是“儒”。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语（上文引的《墨子·公孟篇》与《非儒篇》，都有“古言服”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明白殷、周民族在语言文字上有多大的区别）。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才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他们虽然不是新朝的“士”，但在那周、宋、卫、齐、鲁、诸国的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他们要算是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士”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的名称来泛称他们。

……

大概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一般普通殷民，自然仍旧过他们的农工商的生活，如《多方》说的“宅尔宅，畋尔田”。《左传》昭十六年郑国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勾夺；水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徐中舒先生曾根据此段文字，说：“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国学论丛》一卷一号，页一一一。）此说似甚有理。“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

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子的远祖正考父的鼎铭，虽然

是宋国的三朝佐命大臣的话，已是很可惊异的柔道的人生观了。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前799年），武公元年当平王六年（前765年），宣公元年当平王二十四年（前747年）。他是西历前八世纪前半的人，离周初已有三百多年了。他的鼎铭说：

一命而倮，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矧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

这是殷民族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教训。儒之古训为柔，岂是偶然的吗？

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

……

三

我们现在要看看“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孔子以前，儒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道了。但我疑心《周易》的“需”卦，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大，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彖传》：需，须也。）《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彖传》说：

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程颐《易传》说此节云：

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

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糊其口，故需为饮食之道。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

……

这里的“需”，都可作一种人解；此种人的地位是很困难的，是有“险在前”的，是必须“刚健而不陷”的。儒在郊，完全是在野的失势之人，必须忍耐自守，可以无咎。儒在沙，是自己站不稳的，所以说“衍（愆）在中也”。儒在泥，是陷在危险困难里了，有了外侮，只有敬慎，可以不败。儒在血，是冲突之象，他无力和人争，只好柔顺的出穴让人，故《象传》说为“顺以听也。”儒在酒食，是有饭吃了，是他最适宜的地位。他回到穴里去，也还有麻烦，他还得用敬慎的态度去应付。——“需”是“须待”之象，他必须能忍耐待时；时候到了，人家“须待”他了，彼此相“需”了，他就有饭吃了。

……

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筮书的一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最通用的筮书。《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取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一个现象为题，其中无甚深奥的哲理，而有一些生活常识的观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知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蒙”卦的初爻说：“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以往，吝。”这里说的也很像希腊的俘虏在罗马贵族家里替他的主人教儿子的情形。）

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墨子·非儒篇》有一段描写当时的儒：

夫（夫即彼）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毕沅据《孔子世家》。解浩居为傲倨），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这虽然是一个反儒的宗派说的话，却也有儒家自己的旁证。《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韩诗外传》作博）带，蟹螺其冠（杨倞注引《说苑》淳于髡述“邻圃之祠田，祝曰，蟹螺者宜禾，汗邪者百车。”“蟹螺盖高地也，今冠盖亦比之。”），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王念孙云：举读为相与之与）其上客，惇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用战国晚期荀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

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

第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

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倨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洁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

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

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股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那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泯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自恨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左传》又说，孟僖子将死时，遗命要他的两个儿子何忌与说去跟着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的职业是一个教师，他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脩是十脰脯，是一种最薄的礼物。《檀弓》有“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的话，可证束脩是赠礼。孔子有“博学”、“知礼”的名誉，又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故相传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就是他的职业了。

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他作中都宰时，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见《檀弓》有若的话）。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

他和他的大弟子的生活，都是靠授徒与相礼两种职业。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

……

最可玩味的是《檀弓》记的这一件故事：

孔子在卫（也是一个殷文化的中心），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足以为法矣。……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既葬，“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为虞祭。）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孔子叹赏那人的态度，而他的弟子只能计较仪节的形式。所以他那些大弟子，都是“习于礼者”，只能在那些达官富人的丧事里，指手画脚地评量礼节，较量袞袞与裼袞的得